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政治转型的推进

武 澎 东

- 一、经济转型启动后的经济增长
- 二、经济转型启动后的税收及预算管理改革
- 三、推进政治转型, 缓解资源垄断, 理顺行政与立法、司法关系
- 四、结论

“十二五”规划把 2011-2015 年定为“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并提出了“改革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开放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的方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可追溯到“九五”计划及“十一五”规划纲要第二章“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六个必须”中的第二个“必须”。而“改革顶层设计”则是“新的提法”, 备受各界注视。

在现行的体制下, 经济转型绝非几年即能实现, 其最大的原因在于国家垄断土地等资源配置, 行政权力过大, 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一直未理顺上。而这些都是不是单靠经济转型就能解决的问题。《行政许可法》、《物权法》、《反垄断法》也难使民营经济不断创新、发展。行政指导式的工资上涨也非民营经济中所有的企业所能承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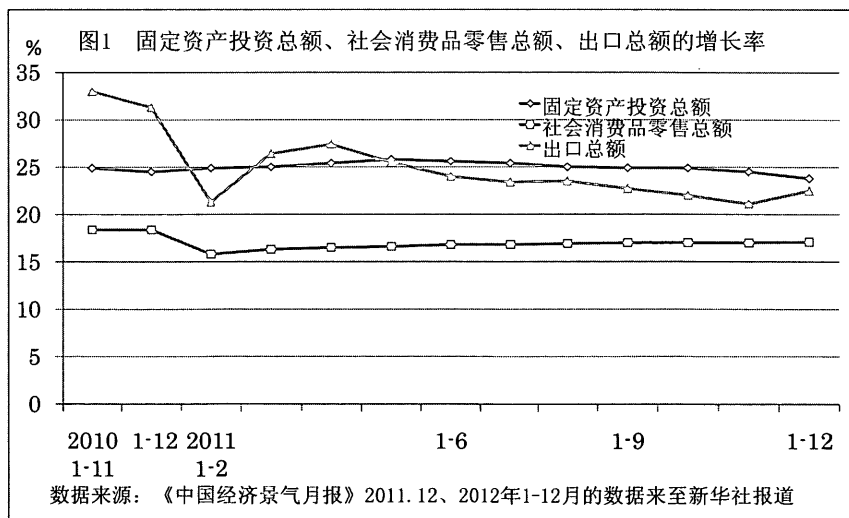
2012 年是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决定新一代执政者完成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的一年。也是台湾、俄罗斯、法国、美国及韩国选举国家领导人的一年。在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这一年, 以“顶层设计”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立即启动。因为即使日后经济转型得以实现, 中国的产业构造与发展方式也只不过是和现

在的先进国家相似。金融、财政等各种危机及失业、萧条等问题仍会发生。只有不断创新,拥有多数的“比较优势”产业,才能使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在经过盘点经济转型启动后的经济增长及税收、预算管理改革后,建议在现在经济运行尚佳之时,积极地加速推进政治转型。并在“改革顶层设计”时,必须设法理顺行政与立法、司法的关系。

一、经济转型启动后的经济增长

2011 年是“十二五”规划期的第一年,也是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第一年。2011 年中国 GDP 比上年增长 9.2%,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9.7%,二季度增长 9.5%,三季度增长 9.1%,四季度增长 8.9%⁽¹⁾,每个季度的增长率都在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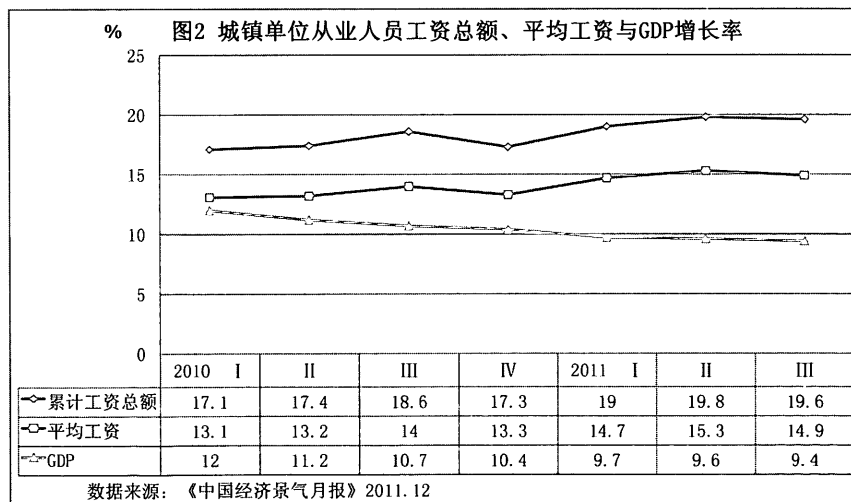
图 1 是 2010 年 1-11 月到 2012 年 1-12 月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从图 1 可以看出 2011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增长率有半年,即1-3月到1-8月在25%到25.6%之间,另外5个月在24.5%至24.9%之间,可以说没有多大变化。全年(1-12月)则为23.8%比2011年的24.5%减少0.7个百分点。从数据上看没有在经济转型启动后出现剧减的现象。

2011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除了1-2月的15.8%外,1-3月到1-11月一直都在16.3%-17%之间,全年则为17.1%。从数据上看,在经济转型启动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非但没有增加,反倒比2010年的18.4%减少1.5个百分点。从图2看,2011年三季度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累计工资总额的增长率,已经从2010年一季度的17.1%增加到19.6%。2011年三季度平均工资的增长率也从2010年一季度的13.1%增加到14.9%。二者虽然都比GDP增长率高,可是并没有使2011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有所提升。

2011年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为22.5%。全年的增长率虽然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以上,可是和2010年的31.3%相比也减少了8.8个百分点。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下降,显示国外需求减少,外贸出口受到阻碍。据海关统计,今年(2012)1月,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7.8%,其中进口下降15.3%。1月份进口的大幅下降,显示目前中国外贸,除有国外需求减少的问题,还有国内需求不足,也



就是说供大于求,生产大于消费。特别是中小型外贸企业困难增多,这些既不是经济转型所期待的结果,也和经济转型启动没有直接的关系。

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1月,中国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为7381亿元,远不及市场预计的近万亿元,狭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也仅为3.1%,低于往期数据。虽说今年1月有所谓的“两节”因素,但是从信贷增量比2011年1月少增了近2900亿元,增量下滑近30%上看,其中也应有内需不足的成份在内。

从2011年12月起,工业增加值、发电量等指标增速出现反弹,制造业PMI也连续两个月呈现回升现象。2012年1月的新订单指数和采购指数分别是50.4%和50.2%,比2011年11月最低点回升2.6点和1.2点。可是2012年1月的CPI同比上涨4.5%,环比上涨1.5%,除去2011年价格上涨约为3个百分点的翘尾因素外,新涨因素约为1.5个百分点。2012年1月的CPI也与信贷的数据一样,背离市场预期。2011年四季度,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在金融危机以来首次负增长。1月的贸易数据公布后人民币汇率连创汇改以来新高。

此外,随着加速推进城镇化,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成本逐步上升,加之节能减排和资源价格改革,税费改革等结构性调整引起的成本上升,这些都将加大物价上涨的压力。今后货币信贷调控对投资的影响,外需和出口的下滑,都将使2012年的经济增长减速。特别是IMF在2012年2月曾警告说,如果欧洲债务危机出现最坏局势时,中国的GDP增长率有下降到4%-4.9%之间的可能性⁽²⁾。这些都是中国目前经济运行上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现在,最常见的说法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科技力量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落实各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促进进口的政策措施,使外贸发展、经常项目收支更加均衡,形成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使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让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并使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5%以内的说法。

可是从上述的数据可以了解经济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仅用“十二五”规

划里的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特别是以消费需求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法,不是在欧洲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以及现行体制下,花上几年功夫即可达成的。今后,如要既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增长,又能达成经济转型,除了国务院下达的各种通知、规定,政府各主管部门的各种政策外,必须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要加速以行政和司法改革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

二、经济转型启动后的税收及预算管理改革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启动后的第一年,政府启动了税收、预算管理上的改革^③。首先在2011年1月28日,上海和重庆为了打击投资投机及调节贫富差距,开始实施房产税征收试点。4月14日,科技部又率先公开了“三公经费”,使人觉得税收、预算管理改革向前迈进一步。可是房产税征收的结果,也只是抑制部分资金继续流向房地产,并提高了财政上的收入。只要房价不降,就难让买不起房地产的人感受到贫富差距被调节了。科技部虽然第一个公开了“三公经费”,但其内容仅有,“三公”经费预算:“2011年,科技部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4018.72万元”50来字,并没有任何详细的说明与解释。且迟迟未公布的机关甚多,从整体来看公开的范围太窄,内容不够详尽,透明度也太低。

6月30日人大通过个税法修正案,将工薪所得税免征额提高至3500元,减少了低工薪收入者实质上的负担,对提高生活,促进消费有所裨益。9月30日,国务院决定在新疆及西部地区试点的基础上,从11月1日开始在全国实施石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并且在变“从量定额”计征为“从价定率”的方式下,实施计征最低税率标准。可是此次推进资源税改革仅限于石油、天然气资源税,比当初设想后退很多。

财政部也在10月20日,下发了《2011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的通知,选择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展开了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试点。

此次财政部赋予地方政府有限制的举债权,有过大行使行政权力之嫌。因为现行的《预算法》是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的。地方举债只能由财政部代发并将之视同国债办理。此次未经人大立法或修改现行的《预算法》,仅由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下发了《2011 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办法》的通知,就有效地解决了地方政府融资权的问题。这种一如既往的做法,充分显现了行政与立法、司法权责不分,行政权力过大的弊端。

11 月 17 日,国家税务总局也和财政部一起发布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决定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一部分现代服务业,展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试点。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也与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相仿,以行政部门联合下发通知的方式试点。各种报章杂志报道的上述改革,基本上均属财税改革的范畴。除个税法修正案外,都是以行政指令的试点方式展开。

温家宝总理也在 2012 年说,推进垄断行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要落实“新 36 条”并在 2012 年上半年把实施细则制订出来,促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能源、交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并强调分配不公以及反腐败问题,都得靠改革及制度性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张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进依法行政,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深化政务公开,健全监督制度,建设服务、责任、法治、廉洁政府⁽⁴⁾。

在三权分立的国家,政府无论推行任何政策,一定要先行立法或修改现行法律条文,然后根据新通过的法律,由政府各有关部门负责执行。政府各部门所发的各种“通知”、“办法”或“规定”也都是根据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制定的。行政裁量权也必须是立法或司法机关认可的一种属于执行上的权力。然而中国不是三权分立的国家,也曾许多场合公开表示今后不实行三权分立。中国的地方领导也不是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所以地方领导的政绩是由行政考核, GDP 增长速度就是考核时最重要的指标。因此政府官员为了政绩,经常利用行政上配置资源

的权利,营造“形象工程”,屡禁不止造成许多弊端。地方领导如能改为民选,其政绩自然是由选民考核。竞选时的公约是否实现,突发事件是否处理妥当,有无丑闻、渎职等都将列为选民判断政绩的对象。考核的标准也因各地选民而异,既不需要上级选拔、考核,也不需要以GDP增长速度作为考核政绩好坏的标准。利用行政上配置资源的权利营造“形象工程”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些都可以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首次是出现在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讲话上,邓小平说“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又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从1978年到1986年,有20次讲话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有9次是专门谈政治改革⁽⁵⁾。可见政治体制改革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酝酿。

1997年,中共在十五大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方略,确定了法治民主治国之路。2002年,中共十六大和2007年十七大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再次强调依法治国及司法不受行政干预独自审案。可是现在在政治改革步伐不大,政治透明度仍然不高。譬如说国家选举领导人,表1是今年举行领导人选举的国名和选举日期。这个表中只有中国的日期不详,只能填个“秋”。国外的许多报道制作的表也都和表1一样。其实选举日期、候选人名单、竞选方式等信息不能算是机密,在许多报章杂志及网上都能查到。但是何人当选,不到最后谁也不知。可是中国,事前选举日期、候选人名单、竞选方式既无报道,也查不到。可是奇怪的是大家都知道甄选结果,知道下一任国家领导人是习近平,和当年的胡锦涛一样,正在国外访问。

表1 2012年领导人选举

台湾	1月14日
芬兰	1月22日
俄罗斯	3月4日
法国	4月22日
中国	秋
美国	11月6日
韩国	12月19日

中国的领导人,大家都知道是从中央政治局里甄选出来的。至于几人参选,如何进行与决定则鲜为人知。一般民众和绝大多数的党员事前不知,整个过程

也无权参与。这些都是党和政府的公权力过大所造成的。拥有过大公权力的党和政府在行使自己拥有的权力时,容易产生这是党或政府的事,没有必要向“外人”说明”,的想法。也容易产生“这是我们的事,凭什么要你告诉你,凡事都要向你汇报”,的心态。2012年2月,媒体报道说,中国提出要和美国建立信赖关系。可是现在连中国领导人的甄选日期,都不知晓的美国媒体与民众、大概也不知如何才能与如此“神秘”的中国建立起信赖关系。这种不必要的不透明的政治手法,只会显出中国是个不民主、不法治的国家,毫无可取之处。

以往的中国,行政权力过大,现在从2011年的税收、预算管理上的改革上看,中国的行政权力依然大的惊人。有时仅靠国务院或各主管部门或几个有关部门联名的“通知”、“暂行办法”、“暂行规定”就能试点、决定、执行而不需要事先立法。并且在决定及执行的过程中还有很大的行政裁量权,有时甚至可以有意或无意的违反自己的“通知”、“暂行办法”或“暂行规定”。然而握有如此大权的行政部门,连税收、预算管理改革都要打些折扣无法照当初计划推行,尤其是在国家垄断的资源配置,特别是在土地垄断上,居然显得弱不禁风,无力可施。

三、推进政治转型,缓解资源垄断,理顺行政与立法、司法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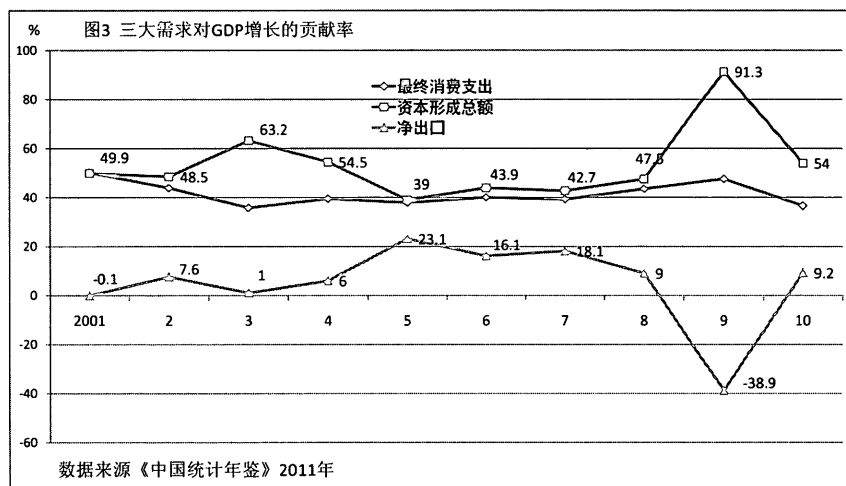
在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然而中国的土地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这就使土地成了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交换价值之物,无法当作商品在生产要素市场上交易,也难发挥土地利用所应有的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后,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日渐重要,城市土地市场也形成了土地使用权出让市场和土地使用权转让市场。如此一来土地使用权可以商品的身份在生产要素市场上进行交易。这就使土地资源利用和开发,在商品化、市场化下,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这对人均可用土地资源严重不足的中国来说,无疑是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的合理性。

然而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是由国家地产机构垄断经营的。这种做法使城市

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分离出来的城市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权,又被国家垄断,结果既使生产要素市场和市场机制无法完善,又使行政过多的干预价格形成机制,从而大大的减少了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加之国家可以征用集体所有土地做为国有土地,并能将其放入城市土地转让市场中。这种做法既导致国家侵犯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又加大政府投资的能力与投资欲望,从而引起官员们的贪污腐败等弊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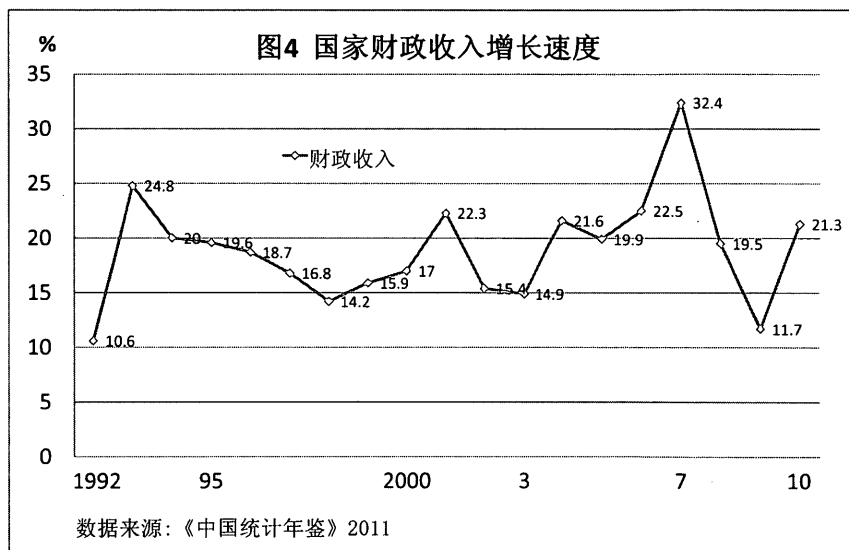
图3是2001年到2010年三大需求,即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消费、投资、出口一直被称为是三驾马车,政府投资的能力与欲望加大,资本形成总额就会像图



3 所显示的居高不下的状态。特别是在净出口急速下降时,资本形成总额显著地提高。譬如2009年,当净出口急速下降到-38.9%时,资本形成总额竟高达至91.3%。从图3中可以明显地看出,2001年到2010年三大需求中的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一直呈现“上下对称”,此强彼弱,互为消长的格局。这与最终消费支出,除2001年曾一度达到50.2%外,一直徘徊于35.8%至47.6%之间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由投资弥补出口不足的经济高速增长方式,使国家财政收入从 1992 年的 3483.37 亿元增至 2010 年的 83101.51 亿元。图 4 是 1992 年到 2010 年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这种最低为 10.6%(1992),最高达 32.4%(2008)的增长就是在以投资弥补出口不足的方式下实现的。1992 年到 2010 年的这种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在同时期,不仅发达国家远不能及,就是新兴国家也未见达到。

这些年来,政府利用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除了继续向经济领域投资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向教育、卫生、住房、社保等民生领域投资,加大了对公共服务



投资的力度。然而今后在欧洲财政危机,叙利亚、伊朗问题带来的不稳定性以及全球景气难以迅速回复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恐怕难以持久。因此,除了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奖励出口,促进消费外尚需在经济运行尚未出现大的波动之前,应尽早缓解国家垄断土地资源所有带来的体制上的基本问题。

现在,土地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和用以招商引资的最佳手段。而招商引资上项目的多寡又直接关系到地方官员政绩的好坏。因此许多投资往往集中在短期见效的项目上,有时甚至不惜引入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项目。土地的垄

断看似在地方官员的政绩、财政收入及增加就业上有所裨益，但是也不能忽略其对法治建设的影响。也只有国家大量放出各种名目的土地，才能真正降低房价，才能在不减少耕地情况下，利用经济供需原理，有效利用不适合耕作的土地，将各种建筑物向不可耕地上规范发展。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就是建在热气灼人不可耕作的大沙漠上。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也是建在滨海小镇。因此国家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以立法的方式，加快推进缓解国家垄断土地的问题。

行政性垄断、国家垄断导致生产要素市场化滞后，不是转变经济运行机制所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改变资源的定价机制，加快建立土地、自然资源的要素市场，由市场决定资源价格就能解决的。如今资源配置，信贷资金偏向国企等公有制经济，从2002年就不时有“国进民退”的说法，然而“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非公有制经济完成的”^{〔6〕}。在这方面可以说“民强国弱”。今后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引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时，必须杜绝过多的行政干预，大上项目与民争利等弊端。

国家在资源上的垄断和行政干预微观经济运行的行为，容易导致腐败蔓延。可是为了杜绝垄断的反垄断，往往又强化了国家垄断及行政对经济领域的干预。

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反垄断法。这个姗姗来迟并且要在1年后的8月1日才开始实施的法律，是否能减少国家在资源配置上的垄断以及行政权力的滥用呢？反垄断法第1章总则的第7条、第9条和第10条的内容是，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行业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的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对其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价格，依法监管和调控。国务院内设立反垄断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国务院规定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负责执法，且能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应的机构负责执法。

可是我们觉得，第一，国家应该不论任何行业，只要是合法经营都应给予保护，并依法监管，不应专立条文只提专营专卖的行业。第二，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的反垄断委员会最好设立在司法机关内，是否违法应由司法判断。第三，国务

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只能负责执行,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应的机构只能协助。否则专营专卖由国家保护、监管,其他行业全由国务院判断、决定、执行、处理而且能授权地方负责执法的做法,只会造成反垄断法被国家及行政机关垄断,徒使行政权力“更上层楼”。因为只凭第8条“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是不足以限制、规范国家垄断和过大的行政权力的。再者连任何行政机关及组织,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的基本前提下,都得专立条文,这是不是想说明行政机关及法律授权的组织,无此条文警惕,就常会有“越轨”行为。

上述的这些状况,都不是只凭经济体制改革就能缓解的问题,何况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真正到位。中国至今仍未建立起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是在1982年3月,五届人大通过决定而设立的体改委,却在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降格为国务院体改办了。2003年体改办又被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吸收合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建议和实施方案明显地减少。1989年由体改委创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也在2001年停刊,2002年复刊,2007年再次停刊。200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年鉴》被更名为《中国改革年鉴》重新刊行,主管从财政部回归发改委,定价也从250元猛涨到460元。从体改委的降格、吸收合并以及年鉴发行、主管更换、价格猛涨上、也能看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后退了。

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样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度更是缓慢。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在不实施三权分立的现行体制下、如何使行政、立法和司法能相辅相成、互不掣肘,均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及早理顺,不能只靠现在的各级政府必须接受各级人大的监督,必须接受公民和社会的监督的做法,处理行政和立法的关系。更不能使过大的行政权力挤压司法,阻挡社会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政府在执政时,应该先由立法机关审查行政部门送上来的草案,通过后再让行政部门依法执行,至于是否违法最终应交司法机关判断。行政部门不可擅立规章,自行执行,自行判断。行

政部门所有的规章都必须依法制订,所有行政部门、立法机关及司法机关,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如有违法都要受到法律制裁。譬如像日本的防卫部,经济产业部这种相当于中国的国防部,经济部的行政部门,如果有违法行为,司法机关的相关部门能以了解真相为由,搜查防卫部,经济产业部并能扣押文件等证据。这种壁垒分明、各尽其职,法律之前不论个人、企业或行政、立法、司法机关一律平等的方式,有效地遏止了腐败的蔓延。因此行政、立法、司法都要在经济运行形势尚佳时,把握时机加快改革,积极地、快速地理顺三者关系,实现公正执法,以期早日建立民主法治国家。

四、结论

2001年以来,三大需求中的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一直呈现上下对称,此强彼弱,互为消长的格局。2011年四季度,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在金融危机以来首次负增长,2012年1月外贸进口的下降高达15.3%,信贷增量下滑近30%,CPI同比上涨4.5%。人民币汇率也在2012年1月的贸易数据公布后连创汇改以来新高。此外,能源、原材料、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成本逐步上升,节能减排和资源价格改革,税费改革等结构性调整引起的成本上升,将会加大物价上涨的压力,影响中国经济的运行。

近年来,中国政府利用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向经济领域及教育、卫生、社保等民生领域投资,可是这种方式恐难持久。今后,除提高投资效率,奖励出口,促进消费外,应在经济运行尚佳时,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加速推进政治转型,尽快缓解国家垄断资源配置等体制上的基本问题。

生产要素市场化滞后,不是改变资源的定价机制,加快建立土地、自然资源的要素市场,由市场决定资源价格就能解决的。国家垄断资源配置和行政干预微观经济的运行,极易导致腐败蔓延。但也不能落入以反腐败、反垄断为名强化国家垄断,加大行政权力的陷阱。

现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在不实施三权分立的现行体制下、使行政、立法和司法能相辅相成互不掣肘,均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改革顶层设计”应朝向强化立法和司法、并理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上设计、推行。

注

- (1) 本文中使用的数据在 2012 年以前,来源是《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11.1—2012.1。2012 年 1、2 月的数据则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和中国政府网的报道。
- (2) 日本经济新闻、2012 年 2 月 19 日。
- (3) 2011 年的财税改革参考了《中国改革》2011 年 1 月—12 月及新华网社报道。
- (4) 《人民日报》《上海证券报》2012 年 2 月 13 日。
- (5)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0,176 页。周金华《中国政治现代转型的轨迹》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2 月,第 349 页。
- (6) 2009 年 11 月 6 日贾庆林《在第三届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改革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改革年鉴 2010》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2010 年 12 月,第 39 页。

参考文献

- (1) 张平《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上,人民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 (2) 中国改革年鉴编纂委员会《中国改革年鉴 2010》,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2010 年 12 月。
- (3) 刘洪《中国非正规经济》,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年 3 月。
- (4) 陈斯喜《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流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年 4 月。
- (5) 陈佳贵、李杨《2012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 12 月。
- (6) 于良春、张伟《国行业性行政垄断的强度与效率损失研究》,《经济研究》,2010 年第 3 期。
- (7) 周天勇、张弥《中国土地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修法》,《财贸经济》,2011 年第 2 期。
- (8) 冯海波、刘勇政《多重目标制约下的中国房产税》,《财贸经济》,2011 年第 6 期。

- (9) 吕炜、王娟《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缘何难以实现》，《财贸经济》，2011年第6期。
- (10) 武鹏《行业垄断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10期。
- (11) 侯为民《评价社会不能忽视价值标准》，《经济学动态》，2011年第12期。
- (12) 吴敬琏、高尚全、钱颖一、蔡昉等《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